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4
青銅器 (上)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4 青銅器（上）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4 青銅器(上)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本卷主編 李學勤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張國生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彭華士 符昂揚

圖版攝影 王露 孔立航 郭羣

姜言忠 孫克讓

印刷者 文物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八五年六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八〇六八·一四二七

國內版定價 一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中國美術全集



本卷主編

李學勤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西北大學歷史系、南開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

凡例

一 《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卷分上下兩冊。選錄範圍，上冊自早期銅器開始，包括商、西周各個時期青銅器精品；下冊則包括春秋、戰國、秦、漢，直到唐代。

二 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為主，酌收有代表性的重要傳世品；除器物本身的美術價值外，還儘可能照顧到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三 上冊卷首載《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一文，作為概述。圖版均附說明，以供研究參考。

四 學術界對部分青銅器有不同見解，在圖版說明中適當介紹。

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李學勤

一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文物門類之一，也是美術史上的璀璨明珠。

早在公元以前的西漢時期，已有發現和研究青銅器的記載。據《史記》，漢武帝藏有一件銅器，李少君指為齊桓公陳於柏寢之物，檢視銘文，果然是齊桓公器。又有汾陰巫在后土祠旁掘得大鼎，上報朝廷，武帝以為祥瑞。至於後來張敞考釋美陽所出尸臣鼎一事，更為人所熟知。此後歷代青銅器的發現，史不絕書。到北宋時，有專門的青銅器著錄出現，不僅有圖象、銘文，還詳記出土地點、收藏流傳情況以及尺寸、重量等，體例相當完善。青銅器的美術價值，當時已受到充分重視。

中國青銅器以品類繁多、製作精美著稱於世。這首先是由於中國是文明古國，青銅器的產生很早，源遠流長，匠師們在幾千年過程中積累了精湛的技藝，形成了獨特的傳統。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工藝、形制、紋飾都有自己的風格，在世界美術史上獨樹一幟。同時，中國自古以來是多民族的國家，在祖國遼闊大地上生息蕃衍的各個古代民族，對青銅器美術各有創造，這又為中國青銅器帶來了豐富的多樣性。

中國青銅器在什麼時候和地區起源，目前仍是學術界探索的課題。一九七三年，在陝西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中找到一件半圓形殘銅片，給人們提供了值得注意的信息。銅片發現於一處房子居住面上，房子的碳十四年代經校正約為公元前四千七百年。科學鑒定銅片成分係黃銅，即含鋅的銅基合金。冶金學者通過實驗，證明用原始冶煉方法可由銅鋅礦得到黃銅。這一發現如沒有地層擾動問題，可說明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國已存在冶煉銅的技藝。

一九七五年，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窑類型遺址出土一件單範鑄造的銅刀，鑒定得知其成分為青銅。

當地馬家窑類型地層的碳十四年代經校正為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這是迄今在中國發現的最古青銅器物。此外年代較遲的早期銅器，近些年還有不少發現。

根據這些事實，有學者提出，一般稱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些考古文化的性質應重新考慮。如仰韶文化一部分可劃為早期銅石並用時代，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等則為晚期銅石並用時代。這一看法自然尚需討論，不過在龍山文化晚期和齊家文化中，有關銅器的發現較多。相信隨着田野考古繼續開展，中國青銅器起源的脈絡不久會得到闡明。

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石器晚期文化裏，已為青銅器的發展準備了種種前提條件。撇開冶鑄技術方面的條件不論，青銅器的幾項美術因素都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找出前身。例如青銅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來自石器，而青銅容器則多是從陶器的造型移植的。青銅鼎、鬲、爵、罍之類，無不以對應的陶器為其原型。清代《西清古鑑》書中一件銅鬻，竟與龍山文化陶鬻酷似，這種模仿的例子是引人深思的。

青銅器紋飾也是如此。三十年代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的若干龍山文化陶片，刻有類似青銅器的雲雷紋等。這種刻紋陶器，後來屢有發現。青銅器紋飾中最為人注目的饕餮紋，也有久遠的始源。兩城鎮採集的一件玉簪，兩面線刻饕餮紋，有不同的圖案結構。良渚文化玉器上面，更有多種多樣的浮雕饕餮紋。最近在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龍山文化陶器、木器，多有彩繪，如在陶盤內底有蟠龍紋，其與青銅器花紋的淵源關係顯而易見。

有興味的是，青銅器的銘文也可追溯到陶器。仰韶文化的陶器符號，早有學者指為文字的萌芽。近年在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現可釋讀為文字的符號，多達十餘種，其在器物上的位置及裝飾性的特點，均近於青銅器銘文。其中有的符號又和良渚文化玉器所見相聯繫。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這些文化因素，無疑對青銅器的發展起着推動的作用。

再舉一個具體例證。日照兩城鎮龍山文化陶器有一種三角紋，以填斜線的和空白的三角形相間，可能是由編織器效仿來的。一九七七年，青海貴南尕斯庫勒馬家窑文化墓葬中出土一面銅鏡，鏡背正有這種三角紋的圖案。另外甘肅武威皇娘娘臺所出齊家文化銅刀殘柄，也有較簡化的三角紋。三角紋又是商代較早青銅容器上屢次出現的花紋。其間的連鎖關係是頗清楚的。

上述尕斯庫勒馬家窑銅鏡是現已發現的我國最古銅鏡，是一件罕見的藝術品。它的背紋是鑄成的，以三角

紋折轉成圓周，中心襯成七角星形，有高超的意匠。就鑄造工藝而言，鏡原有鈕，製作也較複雜。甘肅廣和齊家坪也發現齊家文化銅鏡，伴出有帶鋤和雙耳的銅斧，同樣要求複雜的鑄造技術。當時青銅工藝的造詣，於此可見。

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緊緊上接龍山文化的。這種文化屬於青銅器時代，已被公認。二里頭文化青銅器的特點是，在工具、兵器、飾物之外新出現了青銅容器，發掘品有爵，在非發掘品中還有角。

二里頭的爵係以合範法鑄作，器胎很薄，鋤、流都具備，有的有細小的雙柱。爵體樸素無飾的多，或飾以乳釘等紋，鋤上有時有鏤孔。個別的爵底周有覆孟形突緣，便於加溫時吸熱。角的年代可能略晚，底周有同樣突緣，流作管狀，上面有突起的扉稜。製造這麼複雜形狀的器物，當然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經驗。

同一類器物有不同形制，也是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特點。二里頭的兵器有戈有戚，戈更分曲內、直內兩種，有的內上有美觀的雲紋。箭鏃也有幾種不同的型式。

二里頭青銅器還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嵌綠松石的技藝。一件圓形牌飾有綠松石嵌出的許多十字形紋，排成同心圓圈。這種罕見圖案，只在上海博物館一件銅鉞上見到過。二里頭又一件長形牌飾，滿嵌綠松石，構成絢麗的饕餮紋，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關於二里頭文化相當甚麼歷史朝代，眼下還有爭論。學者有的主張其前半屬夏代，後半屬商代，有的認為整個屬於夏代。無論如何，根據這種文化的青銅器發展水平，推想夏代在青銅器時代範疇內，應該是可信的。這對於中國青銅器發展史的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論。

二

二里頭文化以後的商代青銅器，可分為二里岡期和殷墟期兩大階段。殷墟期即商王盤庚遷殷後的商代後期。二里岡期是否包括商代最初一段，要看對二里頭文化怎樣認識，我們暫稱之為商代前期。

北宋以來許多著錄中講的商代青銅器，現在回顧，實際只限於殷墟期的器物。較早的二里岡期青

銅器，是五十年代通過河南鄭州二里岡、輝縣琉璃閣等地發掘纔確定的。

二里岡期青銅器直接繼承着二里頭文化的若干特點，比如容器都是薄胎的。過去曾有人設想，比殷墟早的青銅器胎壁應當更厚，理由是範鑄技術原始，似乎不易製成平勻的薄胎。事實證明，商代青銅器的發展恰好相反，是由薄胎進步到厚胎。

與二里頭青銅器相比，二里岡期青銅器的器種顯著增多，如烹炊器有鼎、鬲、甗，食器有簋，酒器有觚、爵、斚、角、尊、卣、壺、罍，水器有盤、盃，兵器有戈、矛、鉞、刀、鏃，工具有斧、鑿等等，不勝枚舉，商代常見的器種差不多已經齊全了。在形制上有不少特徵，像鼎多錐足，爵、斚平底，觚體粗矮，容易判別。

這個時期青銅器的紋飾，總的來說是没有地紋，即作為圖案襯底的花紋。容器上的紋飾大多作帶狀，有的兵器如鉞也是如此。通體滿花的器物還很少見。紋飾以饕餮紋為常見，其線條圓轉流動，很有特色。在帶狀饕餮紋上下夾以聯珠紋，是當時流行的設計。

突出的扉稜作為器物的裝飾，也開始流行，見於較大的酒器尊上。扉稜作斷續的雲片形，輪廓圓轉，和紋飾的線條相調諧。

有些二里岡期墓葬的隨葬品，青銅器同其他器物合成一組。例如鄭州白家莊二號墓出青銅鼎、罍、爵、盤，同爵相配的是象牙觚。鄭州銘功路西側二號墓有青銅鼎、斚、爵、觚等，其間又有原始瓷尊。看來青銅器和別的器物，在使用上當時還沒有嚴格界限。

二里岡期已能製作大型青銅器。一九七四年，在鄭州張寨前街出土兩件大方鼎，較大的一件高達一百厘米，重八十二·四公斤。方鼎雖大，相對說仍是薄胎。鼎腹特深，足中空，上粗下細，仍有錐足意味。腹上飾帶狀饕餮紋及乳釘紋方框，表現了二里岡期的特徵。一九八二年，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一處窖藏中又發現兩件類似的大方鼎，形制、花紋均與張寨前街的相仿，高八十一厘米。由此可知，這樣巨大的青銅器那時已不是個別的。鄭州曾發現鑄方鼎用的乳釘紋陶範，因此大方鼎可能即鑄於當地。

這種大方鼎，口沿上有很高的立耳，腹大而足短，整個形狀似若上天下小，不够平衡。但製作者，在腹面上施加U字形三邊的乳釘紋框，饕餮紋帶不在口沿下而移到腹上中部，從而給人以重心靠下的感覺。這說明當時的匠師對器物各部分造形的調諧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

銘文也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一件鬲，口沿內有一字，或釋爲「亘」。已流入美國的一件角，鑿內有「父甲」兩字。這是已知最早的青銅器銘文。

二里岡期青銅器的出土地點，分布得相當廣。河南省境以鄭州爲中心，發現較多。湖北漢水之濱的隨縣、長江北岸的黃陂等地，都有發現。黃陂盤龍城所出數量多，造型風格和河南的很難區別，其精美也無遜色。此外，西至陝西，北到遼寧，都有二里岡期或與之近似的器物出土。

就青銅器發展而言，二里岡期（上層）與殷墟早期間恐怕還有缺環，并非直接銜接。一九七四年河南靈寶東橋發現的一批青銅器，便適於插入兩者之間，河北藁城臺西的部分器物也可能如此。這個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探究。

殷墟期的商代青銅器，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

這個時期青銅器的分佈，比二里岡期更爲廣泛。其中心在河南安陽的殷墟，自北宋卽有發現商代青銅器的記載。北到內蒙古，東到海，西至陝西，南至廣西，都有殷墟期青銅器發現。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都有空前的發展。

考察殷墟的考古成果，可知商代青銅器工藝在武丁之世開始進入盛期。武丁是商朝功業彪著的名王，《孟子》稱他爲天下之盛君。商人的社會經濟在他統治的五十幾年中取得較大的進展。一九七六年在殷墟小屯西北發現的婦好墓，墓主係武丁之妃，見於甲骨卜辭。墓中出土大量青銅器，僅禮器卽有二百多件，器種有圓鼎、方鼎、三聯甗、簋、偶方彝、尊、方壺、壺、甗、缶、觥、罍、爵、爵、盃等，有些器形前所未見。由此不難推想，殷墟一系列王陵如未被盜掘，蘊藏的青銅器應該有多麼華麗和豐富。

從殷墟最早的幾座墓葬裏，曾找到和二里岡期接近的青銅器。到婦好墓的時候，早期的遺迹已很少存在。

殷墟期的商代青銅器，胎壁都比較厚。形制進一步多樣化，而且有地方性的特點。紋飾的演變尤爲突出，不但流行通體滿花，絕大多數有地紋，而且逐漸出現了在圖案上重疊加花的所謂三層花，於是在青銅器上形成了繁縟富麗的新風格。這個風格在婦好墓青銅器中有充分的表現，傳出於年代相近的侯家莊西北岡一〇〇一大墓的三件大型封口方盃，也是繁縟風格的較早代表。

以婦好墓的偶方彝爲例。這件珍貴青銅器形如一對方彝駢列在一起，可是由於橫長形如房屋，所以把器蓋設計成四阿屋頂的樣子，又在蓋緣與器口相接處做出突伸的椽頭。在青銅器上表現建築的形式，是十分新穎的。偶方彝上面的花紋，除以一對口部向下的夔合成的饗餐外，還有立鳥、鴉面、象首等等，異常繁複，極富於神祕的色彩。繁縟與神祕，可說是這一時期青銅器藝術的一個突出特點。

合範法鑄造工藝，這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殷墟苗圃北地發現的鑄銅陶範，向人們顯示了這一點。當時的匠師創造了很多極其精巧的器物，如殷墟所出中柱旋龍盃，在深腹的盃的中心豎立一枝花朵，繞以蟠龍，可用手撥動旋轉。殷墟還出有能分拆的細頸卣，啓蓋後將頸部取下，原來是用以斟酒的觚。這時青銅器還向大型繼續發展。殷墟吳家柏樹墳園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達一百三十三厘米，因爲胎壁厚重，重量達到八百七十五公斤，是至今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鑄造這樣的重器，需要高度的技藝和組織勞力的經驗。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這件巨大的青銅方鼎反映了商朝奴隸制的發達和人民高度的創造能力。

青銅器不僅有禮器、兵器和工具，還出現了較多的樂器和車馬器。青銅樂器常見的一種是鏡，三件或五件成組，也有單獨一件的，被認爲是鐘的前身。銅鼓也出現過，但恐怕不是實用器。銅鏡亦有發現，奇怪的是鏡背花紋近於前述齊家文化銅鏡，與其他青銅器有別，似乎銅鏡本身有獨立的工藝傳統。

殷墟期青銅器有好多動物形的尊，可作立體雕塑觀賞。最常見的是鴉尊、鴉卣，尊象一鴉，卣則表現兩鴉相背而立。這種兩動物形相背的器物，還有兩羊相背的尊、兩豕相背的卣等。象獸形的，尚有象尊、犀尊、豕尊等等多種。這一類青銅器，大多數飾有通體的複雜花紋，或在動物體上再附加各種奇禽異獸。

完全肖生的，可舉商末的小臣隹犀尊爲代表。這件尊與衆不同，全身素面，但其造型十分生動逼真。特別是犀的首部，側豎的兩耳，圓睜的小眼，還有角和嘴的形狀，都很寫實，不愧是一件藝術傑作。

青銅器紋飾表現的動物，少數是肖生的，更多的則是神話性的禽獸。獸面形的所謂饗餐紋，此時應用更爲普遍，有的可看出象龍、虎或者牛、鹿，多數則由夔龍一類神話動物複合而成，甚或附加其

他動物形裝飾，美觀而又莊穆，顯然與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識有關。此外在紋飾中常見的，還有大小禽鳥、龍蛇、夔、象、蠶、蟬，以及圓渦紋、四瓣花紋、雲雷紋等。

在花紋或銘文中嵌綠松石相當普遍，個別還有鑲嵌紅銅的。有的戈嵌有玉質的援，矛有玉質的刃，成為美觀的複合器物。在河北藁城臺西和北京平谷劉家河，先後發現嵌隕鐵刃的銅鉞，尤為珍異，其年代都相當殷墟期的早期，甚至再早一些。

殷墟期青銅器很多帶有銘文，以簡短幾個字的最多，內容一般是族氏、作器者名、祭祀對象等。其中族氏銘文常寫得很圖象化，追求美觀的效果，以致被某些學者誤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字。到殷墟期的晚期，也就是商代末年，青銅器銘文顯著加長，出現重要紀事。銘文最長的有現藏日本的簋，計四十七字。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四祀卣其卣，字數與之相近，是商朝最後一王帝辛時的器物。

這一時期青銅器已表現出較明顯的地方性。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天寶同出土銅甗，是商代青銅器最北的一個地點。一九八一年，內蒙古翁牛特旗頭牌子又發現二鼎一甗，甗上有兩字銘文。其鑄造技術比較粗糙，留有若干鑄補的痕迹。山西石樓和黃河對岸與之相望的陝西綏德、清澗等地，出有大量有北方色彩的商代青銅器，如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環的匕之類，兵器的形制也很有特點。類似的器物，也發現於河北東北隅的青龍，並對河北北、中部有較大影響。

湖南是長江以南發現這個時期青銅器最多的省分。長沙、石門、華容、岳陽、寧鄉、湘鄉、安化、湘潭、醴陵、衡陽、邵陽以至常寧等地，都有發現。湖南商代青銅器大型的較多，鑄作非常精細，寧鄉的四羊尊為其代表作。湘鄉的一件爵，高三十二·八厘米；華容的尊，高七十二·四厘米，均比中原所見為大。岳陽、寧鄉、湘潭等地都出土大鏡，高七、八十厘米，也是中原未見的。這種大鏡在浙江也傳有出土，近年更在福建建甌發現一件，大小和作風都同浙江的相像，年代略晚。

三

上面講到晚商青銅器崇尚華麗繁縟，這和當時統治階級中的奢靡風氣有一定關係。商朝的統治終於在社會矛盾的浪潮衝擊下崩潰，被在西方興起的周朝所取代。這時，青銅器工藝的中心也隨之轉移

到西周建都的陝西關中地區。

周文王都豐，武王以下都鎬，稱爲宗周。豐、鎬兩地相近，在西安附近的長安縣境，遺迹業已發現。該地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收獲甚豐，但青銅器發現相對說還不很多。這可能是由於周王陵墓不在近處，其他有關的重要墓葬羣也別有所在。西周青銅器集中出土地是在岐山、扶風兩縣間的周原。周原本爲遷豐以前的周人故都，後來分封給周、召二公，是王畿以內的又一政治中心。自西漢以來，該地就有發現青銅器的記錄。在清代，周原連續出土著名重器，如天亡簋、大小孟鼎、毛公鼎等，都有極高的價值。從清末到現在，又多次發現青銅器窖藏，例如一八九〇年扶風任家村的膳夫克器羣，一九三三年扶風康家村的函皇父器羣，一九四〇年任家村的膳夫梁其器羣，以及一九六〇年扶風齊家村、一九七四年扶風強家村、一九七五年岐山董家村、一九七六年扶風莊白等處窖藏，都出有較多數量的重要的西周青銅器，爲世人矚目。研究西周青銅器，應以周原器物作爲典型的代表。

周原以西的寶雞，是另一處青銅器大量發現的地點。晚清在寶雞鬪鷄臺出土的包括銅禁的一組青銅器，久已聞名於海內外。後來在本地戴家灣，又有大宗器物出土。附近傳爲西虢封地。在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等地發現西周前期墓葬羣，瑰麗精美的器物很多。值得注意的是其間反映出西北民族的若干特色。西周青銅器在甘肅以至寧夏皆有發現，說明周朝和西北廣大地區有很密切的關係。

在東方，作爲周朝東都的洛陽，長期以來不斷有重要青銅器出土。有名的令尊、令方彝等，即出於洛陽馬坡。近年洛陽北窑一帶發現大面積鑄銅遺址，所出器範與附近西周墓葬的青銅器相對應。這裏的青銅器銘文，出現了西周前期許多重要歷史人物。東方各諸侯國的青銅器也很多，河南濬縣辛村的衛器、山東曲阜的魯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器等，彼此有許多共同點。南方楚國的青銅器，也有一些佳例，其特色自然較多。

西周青銅器是直接沿襲晚商傳統的。特別是東方商朝故地的器物，更能明顯看出對商代青銅器的繼承。可以作爲周初器物特徵的，如簋的方座，鼎、卣、方彝等器上突起特高的扉稜之類，只能說是細小的差別。武王時器如陝西臨潼的利簋，成王前期器如河南洛陽的保尊、保卣，其銘文字體、格式均近於商代。想找出商、周青銅器間的截然界限，事實上或許是不可能的。

商末器物花紋縝麗的作風，在西周早期繼續下來。饕餮紋、夔紋、鳥紋等這時仍然流行，並有多

種多樣的變化。試以周昭王前後的一類方彝爲例，具體實例有上面提到的令方彝、一九四七年洛陽小李村出土的叔逸方彝（或稱王姒方彝）和一九七六年陝西扶風莊白出土的折方彝。這幾件方彝都有通體的繁縟紋飾及扉稜。其花紋包括三層花的饕餮紋，還有雙身一首的「肥遺」式的龍紋、長鳥和小立鳥、顧首卷尾的夔紋等。在把許多神異動物集合於一體這一點上，依然承襲着商代的作風。不過如令方彝有長達一百八十餘字的銘文，則是商代所未見的。

研究青銅器銘文的内容和書法藝術，不得不以西周爲重點。這時像商代那種簡短的銘文，數量也還很多，但從成王後期起，銘文有顯著加長的趨勢。康王晚年的大孟鼎有二百九十一字，小孟鼎銘文更長到三百九十字左右。古書說周人尚文，這可能就是一種表現罷。

周朝的統治在武王、成王兩代奠定了基礎，康王時進一步得到鞏固。昭王南征，遭到嚴重挫折，穆王力圖擴大王朝影響的行動也未取得預期效果。此後西周中期的幾個王世，只能處於守成的局面。這種由盛而衰的變化，在青銅器上也有曲折的反映。穆王時期開始，青銅器紋飾漸趨簡樸，帶狀花紋又流行起來。早期裝飾最華麗的卣、方彝等器種，此時減少以至消失。銘文字體也從雄肆轉爲規整，規範化的套語逐漸加多。只有鐘的產生，是一新現象。

夷厲以後，周朝內外交困，雖有宣王中興，仍不能挽回頹勢。西周晚期青銅器雖然出現了簠、盨、匱之類新器種，但總的說來，鑄造技藝有所退化，像前期那種精美的器物爲數不多。

由紋飾角度看，西周青銅器的演變又反映了文化思想的變革。早期仍在風行的以神祕的動物形象爲主的花紋，中期以後被分解和圖案化，從而削弱了神話的意義。例如中期開始大量出現的竊曲紋，本自卷曲的夔龍蛻變而成，由於分解而失去了原有的整體形象。晚期最常見的重環紋，是截取龍蛇軀體上的鱗甲，形成一種簡單的圖形。這一類趨勢，可能是禮制的宗教色彩減弱，逐步走向儀式化的一種表現。

器種方面，酒器的減少也是值得注意的。《尚書·酒誥》記載，周人鑒於商朝統治階層酗酒沈湎，對飲酒設立了種種限制，以糾正社會風氣。大孟鼎銘文也曾提到這一點。西周的酒器確比商代少。商代最多見的觚、爵、角、斚、尊、卣、方彝等，西周早期還多，中期後竟一起走向消滅。

西周青銅器的珍貴價值，突出表現在銘文上。西周是金文的最盛期，銘文所記內容十分廣泛，涉

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而以敘述祭祀、戰爭、賞賜、冊命的為最多。古語云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於此可得印證。有些學者說西周的長篇銘文價值足與《尚書》一篇相比，是並不誇張的。

武王時利簋銘文記牧野之戰，成王時聖方鼎記周公東征，濬司徒遂簋記康叔封衛，康王時何尊（一說成王時器）追述興建成周，大小孟鼎記對方國的征伐，昭王時令簋等記南征楚荆，穆王時班簋記伐東國，共王時史牆盤概述周初以來史事，厲王時多友鼎記對玁狁戰爭，宣王時毛公鼎銘長四百九十七字，是現有最長的金文。此外，如衛盃、衛鼎、散氏盤等記土地轉讓，魯方彝、兮甲盤等記商賈貿易，召鼎、饒匱等記法律訴訟。這些不過是西周重要青銅器中的幾個例子，其對研究當時歷史文化的重要已可見一斑。

上面已經說到，西周早期銘文字體多遒勁雄肆，中晚期轉入整飭，而懿、孝之時又有一些筆勢散漫的銘文。由於西周王朝的統一，各地所出青銅器銘文，同一時期的字體每每相似，而縱觀各個王世，又有複雜的變遷。對於研索古代書法藝術來說，西周青銅器銘文還有很多奧蘊，需要探求和闡明。

四

西周覆亡，周平王東遷之後，國家由統一而分裂，從春秋時期諸侯稱霸，發展到戰國時期列國分立的局面。過去被歧視為蠻夷戎狄的，如南方的楚、東南的吳越、北方的鮮虞（中山），也先後強盛。在諸侯國內部，卿大夫甚至家臣的勢力興起，甚至取公室的地位而代之。

東周青銅器的演變，充分反映了上述的社會變革。西周青銅器大多數屬於王室和王朝臣屬，進入東周，列國青銅器大量增加。包括一些「庶姓」小國，也都有器物出現。這樣青銅器的地方性顯著加強，呈現出多種風格爭奇鬬妍的新形勢。

周室東遷，首先依靠晉、鄭兩國，不過鄭國不久便中衰了。晉國在春秋時期一再建立霸業，是中原強國。晉人的青銅器，在美術和工藝上一直是比較先進的，而周、衛、魯、齊等地器物風格與之接近，都屬於中原青銅器的範疇。

秦國在宗周廢墟上崛起，在春秋之世忙於鞏固西方，很少東顧，和東方各諸侯國交往不多。因此，秦國的青銅器雖然也上承西周的統緒，但由於長期獨立發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風格。其春秋時器，如陝西寶雞太公廟的秦公鐘、罇，甘肅天水的秦公簋，形制、紋飾都有特點，與東方有別。它們的銘文字體，繼承西周晚年的虢季子白盤，也成為獨特的傳統。

南方的楚國，這時仍受中原統治者的歧視，實際其文化已有很高的發展。楚人青銅器受中原因素的影響，隨着楚國力量的壯大而遞減，漸而建立自己的風格，對周圍各諸侯國起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用，以至把周朝一些同姓諸侯如蔡國都囊括在其影響圈內。江淮下游的徐、吳、越三國，青銅冶鑄工藝均甚發達。特別是徐國的禮器製作精美，吳越的兵器尤為精良，當時名聞天下。

如上所述，東周初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在秦以東還是比較一致的。例如山東煙臺、黃縣發現的紀國器，曲阜、歷城發現的魯國器，河南三門峽發現的虢國器，湖北隨縣、京山發現的曾（隨）國器之類，地域懸隔，組合和形制却多近似，紋飾仍以竊曲紋、重環紋、鱗紋、瓦紋等為主。這顯然是西周晚期的延續。

青銅器的明顯變化，起於春秋中期。我們覺得蟠螭紋的產生，可以作為當時新潮流的一種標誌。所謂蟠螭紋，指以兩條或更多的小螭龍相對糾結，作為花紋單位重複出現的一類紋飾。它自此時出現後，在青銅器上流行了幾百年之久。蟠螭紋是由神話動物構成的，但和與它相配的綯索紋、貝紋、垂葉紋等一樣，只是圖案，不再有神秘的意味。

與蟠螭紋的興起平行，春秋中期開始，銘文也裝飾化了。起初出現的，是文字的筆劃變成綫狀，字形變長。到春秋晚期，南方流行在銘文文字上加以禽鳥形的飾筆，即成為鳥書；北方的晉國則把文字筆劃寫成中間膨圓、末端尖長，呈蝌蚪形，可能就是古人所講的「科斗書」。兩者都是我國古代的美術字體。

春秋中期偏晚的時候，青銅器上錯金的技藝開始出現。這種技術似乎是南北同時採用的，晉國的樂書缶有錯金花紋，器面上還有錯金銘文四十字，堪稱這一先進工藝的代表作。

綫刻花紋也為青銅器新添了光彩。這種裝飾方式是春秋晚期開始的，可能與那時有了鋒利堅硬的鋼鐵有關。春秋中期開始，嵌紅銅的器物也較普遍，有些是透嵌的，從器壁兩面都能看見，應該是在